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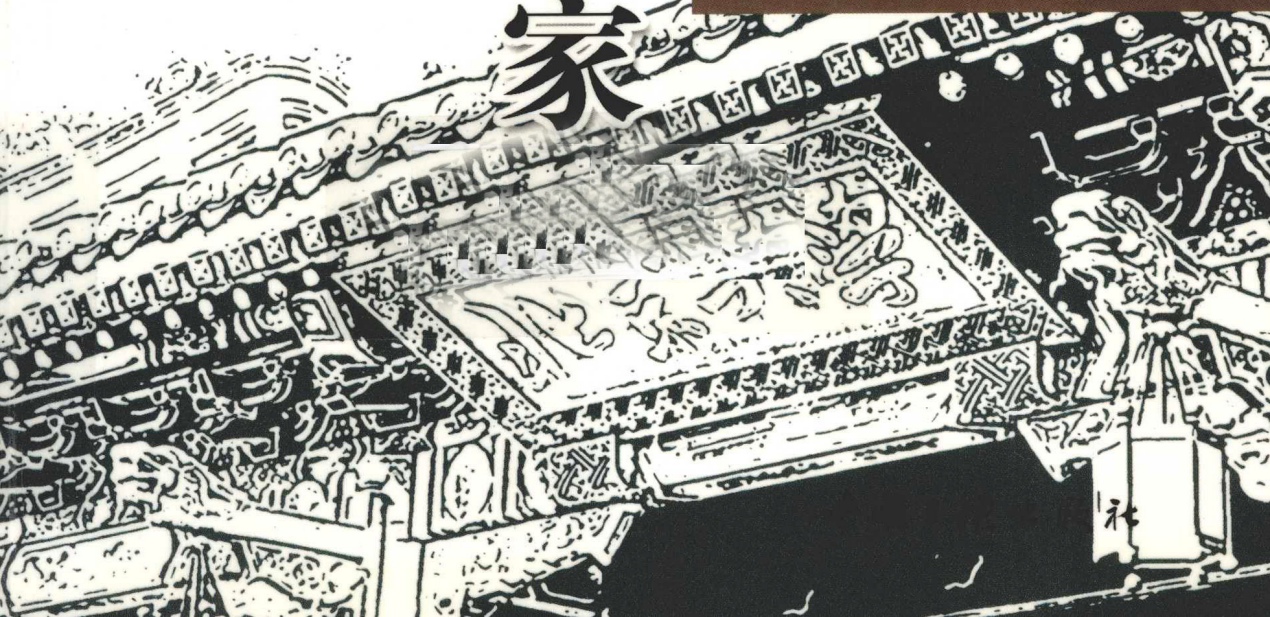
晓 亮◎ 编著

从北大

走出的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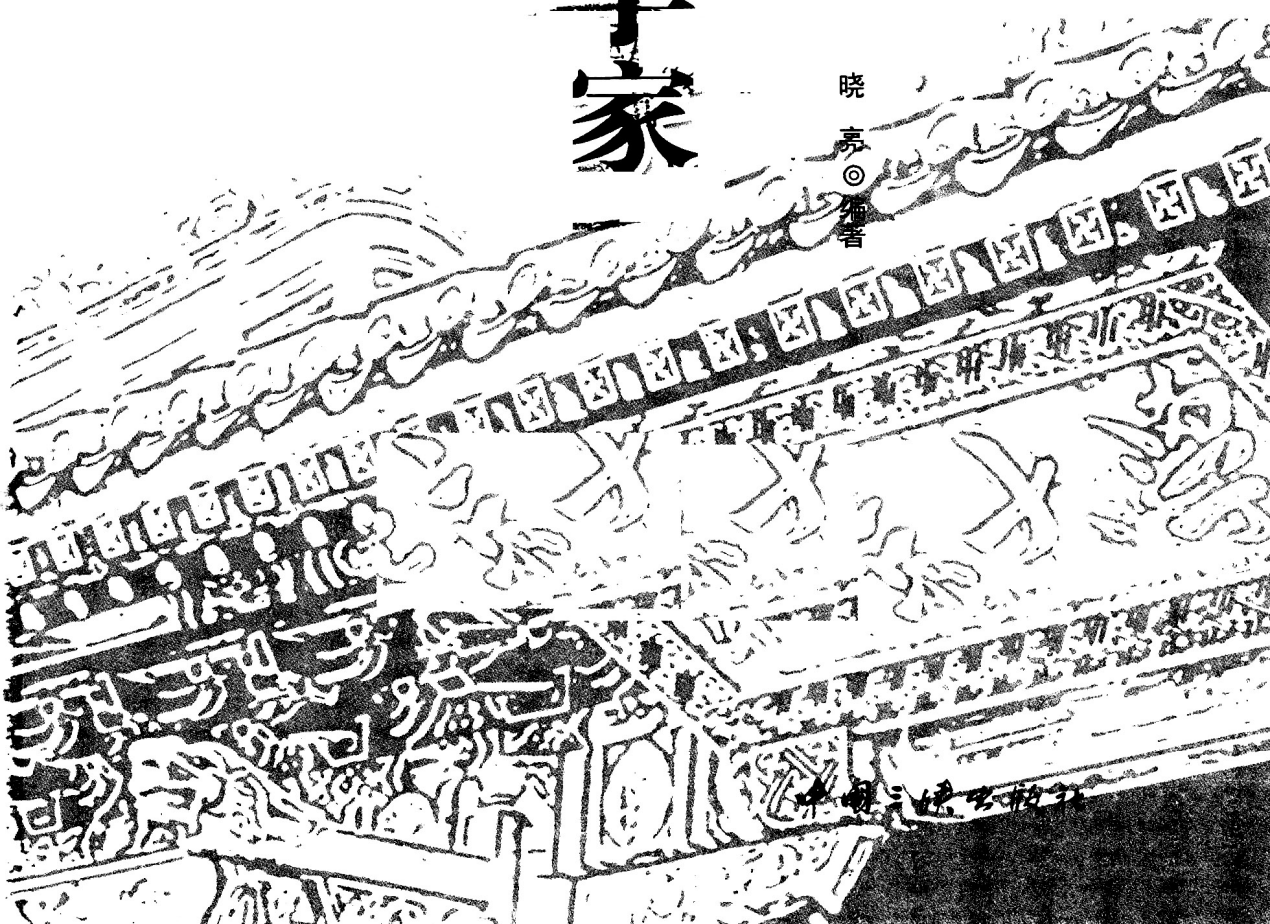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进北大清华，走进文化名家，让我们以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品悟，奋斗和超越。

名家视界书库



从 北大 走出的 文学家

晓
亮◎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北大走出的文学家 / 晓亮编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223-660-8

I. ①从… II. ①晓… III. ①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635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830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24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190 千字

ISBN 978-7-80223-660-8 定价: 32.00 元



前言

从北大走出的文学家

一个个科学家在追求真理中的执着与奋争；

一个个文学家在艺术探求中的选择与爱恨；

一个个教育家理想抱负中的迷茫与清醒。

当一种文明以高贵的姿态来表达；当一种财富以精神为载体来呈现，我们对此除了怀着一种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外，还有一种对那些精神和文明创造者的崇高敬仰。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动机出发，在秉承学术成就和道德垂范的双重标准下，我们精心选取了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走出的在科学、教育、文化三大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他们多为学校的资深教授和中国院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大家的传奇人生予以浓缩，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贡献及成长过程的同时，还着力铺叙他们所亲历的时代风云，以期借助他们的慧眼看历史之风云，观科技之发展，览艺术之璀璨，感教育之影响。将他们的风采整理成束予以集体亮相，无疑成全了广大读者对于精神巡游的期待。回望那些民族大义与人生命运的相互关联，启示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细心整理中，一个人文的脉络日渐清晰，我们发现，不同领域的名家却那么惊人地相似：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胸怀天下而波澜不惊。他们那么朴素真实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的研究似乎离生活很远，却引领着全民族、全人类的进步。长期以来的研究与探索，早已让他们习惯了从容和淡定的生活。然而，在自我领域纵横驰骋的卓越成就，早已不顾他们个人的低调，将其彻底暴露。作为文明的标杆，他们让文化和精神近乎立体化，那么生动，那

么具象——有着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书卷气，当然还有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后留给中国读书人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望其项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站起来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讲述名家人生经历，展示精神风范的窗口，以反省个人与时代、科学与人文为重大主题，诠释人生的真谛，掘取文明的碎金，更成为广大读者精神食粮的仓储！不仅如此，穿插其间的大量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是将这些名家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还原，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索精神。

蜀地的盘山路九曲十折，就像历尽艰难的人文事业一样；而物质的丰裕、生活的安稳一定程度上消磨着一些年轻人探询的热情。对于记忆或许我们本不该太过苛求，但对于这些文化的名家，或许我们需要重提那句俗语：遗忘是可耻的！面对他们，面对历史，或许有责任做这样的自我叩问：时代给予我们如此多元的选择，生活赋予了我们以富足，我们给予了社会怎样的回馈，我们对于自我人生的价值又做了怎样的发挥？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还不确定，就让我们手不释卷走进北大清华，走近那些文化名家，让我们在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愉快的阅读中阐发经典的魅力。追随北大、清华名家的光辉足迹，在人生的自我观照与顿悟中扶正自我、鞭策自我、超越自我。

编者



目 录

从北大走出的文学家

刘师培	001
钱玄同	015
季羨林	032
胡 适	082
徐志摩	132
冯沅君	171
刘半农	184
尚 钺	192
沈从文	204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盒，曾用名光汉。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家学渊源深厚。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1919）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显然有益于我们系统了解这位国学大师的方方面面。

卓越的学术贡献

刘师培自幼濡染家学，开蒙便从母读经书，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5岁前后治《晏子春秋》和学《毛诗》郑笺、《尔雅》、《说文解字》诸书，并大量阅读周秦典籍，打下非常好的国学基础，加之聪颖过人，勤奋

刻苦，随着年龄增长，功力愈益深厚，“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可以说，到1903年（20岁）大量写作和发表著述前，他已经对家学风格颇有了解，知晓《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和古文经学的传承，于经、子、史皆有浓厚的探索兴趣，并认同扬州学风，欲负起弘扬家学乃至扬州学术的大任。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嫠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28页）。综观刘之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

刘师培著述所及，涉猎甚广，方面甚多，但最能体现其国学研究成就的，当为小学、经学和校勘学，其余政治思想和论古今学术思想则为具有时代特色之作。

小学系语言文字之学，清人将其视为研究经学的基础，故经学家大都精通小学，不过他们多集中精力专治一二部书，如研究训诂者，以《尔雅》为主；研究文字者，以《说文》为主；研究声韵者，以《广韵》为主。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则不像前人这样狭窄，他强调：“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刘师培：《正名隅论》，《左盦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417页）。可见他从事小学研究是主张汇合义、形、声三者来探讨的。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差别较大。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家视古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



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刘师培后期的经学研究与前期相比较颇有不同，基本特点是转向笃信汉儒经说。他曾言及惠栋之学是“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这句话恰可概括其后期的经学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左传》和《周礼》之研究是重点。《左传》研究自是秉承家学，但他并未继父祖之业去完成《左传旧注疏证》，而是转而研究自身所曾提倡过的一个课题——《左传》之“例”，撰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一系列专著，把家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之看重《周礼》，除因《周礼》与《左传》相关且在古文经上极其重要外，还因在四川讲学时受到廖平的一些影响。

刘师培之校勘学前后没什么变化，以后期为主。他校书的范围较广泛，遍及四部，但以校订诸子为最多，这些古书主要有《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周书》、《穆天子传》、《楚辞》等。他所校订各书，或名《补释》，或名《斟补》，大致前期所校名《补释》，后期所校名《斟补》，部分《斟补》是在《补释》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校书的方法基本同于先贤，即根据古人用字属辞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的小学功力（如运用由字音推求字义原则）来进行。他也试图发展前人总结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曾写出《古书疑义举例补》，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有所补充，以此方便其他校勘学者。

上述刘师培的国学研究成就可以看出，刘师培是国学研究的多面手，他的贡献是在古典学术的几个方面，非专攻一经或一学的所谓经学家或小学家可比，称其为国学大师似不为过。

刘师培的国学研究特色鲜明，成就突出，颇得时人称誉。但他的学术研究非仅于此，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国学研究。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是他的交融中西之学和学术史研究。

从1903至1908年，刘师培陆续写出《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新史篇》、《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论著，尽管这些论著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是学术与政论的结合，有的以政论为主，但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的，而且是学术“预流”之作。具体言之，《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文杂记》、《古政原始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更多地体现出交融中西的特色，而《新史篇》、《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历史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更多地体现出新史学色彩和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反思意识。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得十分清楚，没有中西交融，便不会出现新史学，没有新史学，中西交融也落不到实处，故而对刘师培著述的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仅就其中哪种特色较明显而言。

在世人心目中，一般皆认刘师培为国学大师、“扬州学派”殿军，实则1903至1908年间，刘的学术精力更多用在上述体现时代关怀的学问上，而于国学研究用力较少，1908年后才是他专意于国学研究的时期。今天看来，他具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更值得注意，也更重要，因为这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学派”先贤之所在，尽管他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对先贤学术有所发展，但那毕竟是在已有“范式”内的前进，非此超越可比。或者说，面对先贤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刘师培即便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也很难说是超越，更何况刘在这些领域中仍基本遵循先人治学遗规，没什么突破。进一步说，刘的经学、小学、校勘学成就既适于乾嘉，又适于清末，时代性不强，刘如仅有这方面的成就，便与先祖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刘的特色恰恰在于他生逢学术转型



时代，可以走与处在经学中心时代的先人不同的路，而且他在这条新路上走得非常好，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故而我们今天评价他的学术，应更多地关注他的具有现实关怀意味的那些成果，才算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才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

❧ 复杂的政治经历 ❧

在1903年开始写作和发表学术著述，以及1905年成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的同时，刘师培又投入政治运动，投身当时排满兴汉的革命大业中，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以“光汉”为名，又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发表大量政论，主张革命，宣扬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介绍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学说，是革命派中少有的学问既佳、笔锋又健的宣传家。他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与章太炎、陈独秀等并肩奋斗，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刚到东京，就遇上了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事件和随后发生在同盟会内部的“倒孙风潮”。在这场风潮中，他是站在章太炎一边反对孙中山的，甚至提出改组同盟会总部的主张。“倒孙风潮”平息后，同盟会内部又发生了新的冲突，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与孙中山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不仅体现在革命方略与革命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双方也更加难以一致。不久，刘师培以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方式信奉和宣扬无政府主义。

自从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以来，刘师培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它的宣传与鼓动上，而于排满兴汉之革命大义则越讲越少。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起初尚是两者并行，刘未完全放弃排满兴汉之革命宣传，他在《民报》及临时增刊《天讨》上发表《普告汉人》、《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揭露清

廷种种暴政，号召人们起来“讨满”，并驳斥了保皇派的一些论调。这些文章颇受好评，尤其是《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得到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激赏，在当时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刘师培的激进若仅限于以无政府主义越过民族主义，从而在思想上独树一帜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思想认识上一步步涉入泥潭，直至投向清廷。刘师培出自经学世家，国学功力深厚，谙熟中国历史，所以他思考问题往往会从这一基点出发，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通过研读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他对幻想中的无政府社会的特征有了一定认识，相较之下，觉中国社会和欧洲、日本不同，国情特殊，与无政府社会最为接近。按照他的逻辑，无政府革命是比民族革命更激进的革命，要实行无政府主义，自然没必要搞民族革命；而中国社会却又最接近无政府社会，固然它亦存弊端，欲矫之，“唯有实行无政府”，但此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与这样的政府合作，促其从接近无政府的状态走向完全的无政府，方为上策。所以，在他那里，投向清廷并非从“激进”剧变为“保守”，而是为实现无政府“理想”又激烈了一次。或者说，他心目中的“激进”已与众人心目中的“保守”划了等号。

1907年底，刘师培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表投靠清廷之意。1908年他自日本归国，投入端方幕府之中，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理想。在端方幕府，他虽身任幕僚，但实际上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较少参与政治活动。

1912年初，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当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蔡、章等人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



刘师培获释后，先去四川任教，传授国学，继而去山西投靠阎锡山。此后又在阎锡山举荐下，来北京袁世凯身边任事。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曾列名于筹安会，助袁称帝。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未被追究，但已身败名裂，不得不避居天津。

杰出的北大教授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后》，《龙坡杂文》，台湾洪范书店1988年版，第162、163页）。

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

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1919至1920学年,“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许德珩、郑天挺、杨亮功、夏承焘、张煦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源源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冯友兰也曾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会面一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



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袁世凯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闿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和精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

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4、25日，1919年3月26日）。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取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4日）。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地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同年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鑫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

当然，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还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了垂之后世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中的是是非非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菊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多，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本社记事录》，《国故》1919年第1期）。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萼、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子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

